

深
圳
见
闻



HENGZHENTIANMEI

前　　言

在社会主义国家创办以“外资经营”和“中外合资经营”为主的经济特区，这是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作的一个勇敢的尝试。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尝试是极其明智的、成功的。为了帮助大家加深对这一新生事物的认识，我们教研室派出几名同志去深圳特区作了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这本取名为《深圳见闻》的教学参考资料，就是他们这次深圳之行的所观所获。

在调查中，他们还对“逃港”问题，特区所在部队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作了一些了解。了解、研究的结果也一并收入了这一材料内。此外，我们还从《人民日报》上收入了两篇素材丰富且有代表性的文章。

参加调查和整理材料的有：杨稳泉、常新来、林云、郑湘滨、谢树浩等五同志。

由于视野有限，肯定会有一些缺点、错误，敬请首长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马列基础教研室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五日

目 录

深圳之行话特区.....	(1)
关于“逃港”问题的对话.....	(28)
一条街道两个世界里的文明哨兵.....	(34)
建设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49)
光明的事业，光明的道路.....	(55)
深圳建设情况统计表.....	(58)

深圳之行话特区

自从试办经济特区以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特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四区之最”（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深圳特区，更是人们议论的“热题”。有的赞赏，有的诧异，有的在赞赏之中还夹着一份担心，更多的人则是迫切希望了解个“究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深圳特区进行了一次调查，现就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谈谈我们所观所获。

一、深圳特区有多大的范围？“特”在哪里？

深圳特区是深圳市（原宝安县）的一部分。位于广东省南部沿海地区，东临大鹏湾，西连珠江口，北靠梧桐山、羊台山脉，南与香港新界接壤。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占深圳市面积（2,020平方公里）的16.2%。特区目前有正式户口的约11.3万人，加上临时户口、建筑队伍，共计30万人。

深圳特区既不是政治特区，也不是思想、文化特区，仅仅是一个经济特区。在政治、思想、文化上它不能“特”，也不允许它“特”，中央和广东省、深圳市委对此非常重视，决不容许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文化在特区自由泛滥。在经济上，它却同内地不完全一样，实行着一些特殊的经济政策。这些特殊的经济政策主要“特”在“两个更加”、“四个为主”。

所谓“两个更加”。一是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它比内地“更加开放”。表现为港澳和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的友好人士来特区访问考察、洽谈业务、投资办企业、旅游

等，比内地更为方便，手续更加简化。比如，特区已经在罗湖口岸设了专门通道，凡是到特区来洽谈业务的，都可以走专门通道，检查的手续简单快捷；从82年9月开始，又允许香港同特区有业务关系的私家车直接从文锦渡开进来；往来特区的港澳同胞，从82年9月21日起，出关时间从原来的下午17时放宽到晚上20时半，等等。二是客商（泛指港、侨商、外商，下同）到特区投资同到内地投资相比较，特区提供的条件“更加优惠”，有些比香港（自由港）的条件还要优惠。比如企业所得税，到内地投资税率为30%，香港为16.5—17.5%，而深圳特区只收15%。又如进出口关税，特区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免征出口税，特区进口自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除烟、酒减半征税外，其他免征进口税。此外，土地使用费、劳动工资、水电费也略比香港低。通过“两个更加”，来吸引客商投资，发展特区建设。

所谓“四个为主”，即特区的生产、建设资金以引进外资、港资为主；经济结构逐步发展为合资、独资企业为主；经济活动在计划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很显然，这些都是与内地所不同的。

二、试办经济特区有什么好处？

特区的同志说，试办经济特区虽然时间不长，但实践已充分证明，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看，它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条。

第一，通过办特区可以更多更快地吸收外资、港资，更准确地引进我国所需要的先进技术装备，更便利地学习外界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以促进我国的四化建设。先从吸收外资来看，截至1983年，特区与客商签订的协议共2500多

项，协议投资18亿美元，实际投入使用4亿美元。这对解决特区的生产、建设资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区的同志告诉我们，从办特区以来，国家对特区的投资仅0.35亿元，深圳由一个不屑一顾的边陲小镇发展为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工农业总产值成数倍地增长，主要是靠贷款和引进外资搞起来的，借人家的钱发财，真是太合算了。再从引进技术装备来看，由于特区对外交往频繁、广泛，实际上成了一个观测世界技术的窗口，这对减少引进中的失误，提高引进的准确性是十分有利的。深圳这几年的引进虽然也曾经发生过上当受骗的现象，但总的来看（或者说绝大多数）是成功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越来越精，准确性越来越高了。如深圳印刷制品厂引进的七彩印刷设备和照相制版技术，乌石鼓石场引进的机械化、自动化设备，蛇口工业区引进的微波通讯设备，光明畜牧场引进的奶制品加工设备等等，都是具有七十年代水平且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设备和技术。乌石鼓石场的机械化、自动化设备，破碎系统采用闭路电视控制，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内地高出近30倍，而且大大改善了劳动条件，减轻了劳动强度。当然，更有意义的是为全国的引进工作提供了信息。至于更便利我们学习外界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那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合资企业还是独资企业，都是我们学习的极好场所。

第二，通过办特区可以为国家建设积累大量资金，创造更多的外汇。办特区后，深圳市不仅工商税、企业所得税等各种税收的收入成倍增加，而且处处都是宝，废物变成了钱，真可以说是“财源茂盛”了。比如以前的荒山野岭、水塘烂地，现在给客商作工业用地的，每平方米每年收土地使用费6.8—27元，用作商业用地的，每平方米每年收70—

100元。过去淤塞河床、危害农田的河沙，如今变成了宝贵的建筑材料。83年深圳市的财政收入达3亿元，比办特区前1978年的0.25亿元增加了10.9倍。外汇收入的增长也十分可观。仅以旅游业为例，83年旅游营业额达4250万元，比办特区前增加了十多倍。

第三，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全区不仅已消灭了待业现象，而且容纳了来自全国各地数量达10万人的建筑队伍。

第四，特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有较大的独立性，全国性的牵连较少，更便于进行经济、管理、工资、市场、物价等各方面的改革和试验，为全国的改革提供借鉴。

第五，可以利用特区这个窗口，直接观察了解国际市场的发展变化情况，研究现代资本主义新的特点，及时调整对外贸易政策，并利用外国资本和市场与资本主义进行竞争。

第六，特区毗邻港澳，把特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管辖下的、以合资和独资经营为主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现代化城市，对收回和稳定香港，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将起到积极的影响。

以上第三至第六条，有些用不着更多的阐述（如第三、五、六条），有的将在下面展开分析（第四条），这里就不一一解释了。

三、深圳特区这几年的发展情况如何？

有比较才能谈发展。办特区前的深圳老城不到两平方公里，小镇上两条十字街，半小时可以跑完，街道两旁大都是“祖宗房”，仅有的一家五层楼的酒店是全城的最高建筑。城区周围则是一大片等待着开发的荒山野岭、水塘烂地。而

办特区后，实际建设不过三年时间，市区一下子扩大了十多倍，昔日的荒山野岭、水塘烂地被一群群雄伟的高楼和一条条平展的大道所代替。全市18层以下4层以上的高楼共建了1,000多幢，18层以上的大厦已经竣工、使用的也有27幢，最高的25层。新辟的29条大道均宽60米，现已全部通车，道路两旁都栽上了鲜花绿草，架起了整齐划一的水银路灯。

办特区前的宝安县只有几家生产化肥、水泥以及搞农机修配的小工厂。现在已有工厂250多家，产品达上千种，行业跨数十个，在香港和国外有点名气的就有好几家。

办特区前，深圳只有一个外事接待站，七家旅店，没有一个旅游点。而到1982年统计，宾馆、旅店、招待所从七家发展到一百二十七家，建成营业的旅游点已有六个。其中拥有四十多幢别墅、宾馆，七百多个床位，二十多项娱乐实施的西沥渡假村，是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建设起来的。

其他变化就不一一列举了，就凭上面这些，就足以说明，深圳这几年的变化确实是日新月异的。真的如人们所述，从前去过深圳的人，已经不认识深圳了；土生土长，从来没有离开过故土的“深圳通”，也深感“概念”的更新，赶不上地貌的变化。家乐家私厂副厂长何添安告诉我们，他们厂有个职工请探亲假回家休息了20天，回来后走到厂门口不敢进去，因为前面的山包不见了。连香港的总督也惊叹他们的建设速度望尘莫及。他作了一个对比，香港的天门区，面积只有10平方公里，他们建设了十二年，而我们只有两三年功夫，就搞了24.4平方公里的建设。

基本建设的情况如此，生产的发展速度又如何呢？市计委综合处的陈科长给我们讲了几笔数字。办特区前的1978

年，全市（即原宝安县）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76亿元，1982年增长到4.9亿元，4年增长了1.78倍。其中工业总产值1978年只有0.61亿元，1982年增长到3.62亿元，4年增长了5倍，83年工业总产值可达7.2亿元，比1978年增长近11倍。这些数字不仅十分令人鼓舞、欣慰，而且清楚地表明，过去以农业为主的深圳，而今正急步奔驰在工业化的大道上。

四、特区的改革搞得怎么样？

特区的改革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他们归纳了十项，给我们印象较深的主要有下面几项。

第一项，建筑施工普遍实行招标的办法。在这方面，他们也曾经走过一些弯路。开始有些工程用内地的老办法，采用行政的手段承建，结果造价上升，工期拖长，不少投资房地产业的港商反映强烈，说深圳的建筑费比香港还高，有的还准备收回资金。对此，市政府规定所有工程一律采用招标的办法，让各建筑单位展开激烈的竞争，招标者看谁家的价格相宜、质量好、速度快、信誉高就承包给谁。这一措施实行后，工程造价大幅度下降，工效显著提高。如国际商业大厦一开始按内地老办法，分给一家建筑公司施工，要价高达680元一平方米，后来实行招标，八家公司竞争，最后由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以398元一平方米承包下来，造价降低了42%。至于工效，普遍比内地要高1.5倍左右。许多从内地去的施工队伍说，在内地建一幢18层的高楼，花上两三年时间是司空见惯的。可在深圳，从基础工程到交付使用，一般都是半年左右的时间。300平方米面积的楼宇原来需要半个月才能往上千一层的施工队，到了深圳一般都是五六天一层。正因为采用了招标和其他一些改革措施，深圳特区的建设到目前为

止所用资金还不到18亿元人民币，这么些钱搞了如此众多的建设，这在国内外建设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第二项，企业相当普遍地实行了合同工制和计件工资制。很多企业从经理到职工一律与公司签订合同，企业可以自行招聘，违反合同规定和不称职者，企业也有权解雇，再不是什么“铁饭碗”了。职工工资则较普遍地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再不是“大锅饭”了。有人担心实行这种劳动制度，会使很多人失业。其实人是要有点压力的。有了压力，就知道兢兢业业工作、勤学苦钻技术的重要，一些小毛病压一压就克服了，一些技术问题压一压就学会了，更何况我们有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我们的职工绝大多数都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自觉的纪律、且奋发向上的呢？所以到现在为止，被解雇的寥寥无几，而且解雇后一般都重新找到了工作。有人说计件工资不适合机械化程度高的企业，理由是这些企业的产品是通过许多人的手集体生产出来的（政治经济学上叫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和产品的社会化），不好落实到个人计件。这种观点在深圳很难找到证据，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企业，机械化程度一般要比内地同类企业高，但他们计件工资搞得很好。具体做法是，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计件方式，即有的按成品计件，有的按工序产品计件，有的按个人计件，有的按班组计件等等。还有人担心搞计件工资保证不了产品质量，其实这也是弱者的理论，在治厂有方的企业家面前是根本不成为问题的。家乐家私厂是一直实行计件工资的，可产品质量不仅在香港打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销售占第一位，而且誉满东南亚。他们有什么“秘方”呢？简单得很：治厂要严。他们规定：除最后一道工序外，凡质量不合格者，一律返工重做，返工的产品不仅取消工资，而且倒罚

一倍；最后一道工序出了问题，因返工往往引起全部工序重来一遍，则不予返工，按市场价格将不合格的产品卖给当事人。在这种规定面前，加之以必要的教育，还有谁会不注意质量呢？此外，在宾馆、餐厅、商店这些服务性企业，则较普遍地采用基本工资加职务工资再加浮动工资的办法，来打破“大锅饭”的工资制度。

第三项，在国营和集体企业中较普遍地推行了大包干的经济责任制。即企业自负盈亏，在完成上缴任务的前提下，企业与企业之间，干好干坏不一样，允许集体福利和职工工资有较大的差别。这样就不仅把个人，而且把单位的集体积极性都较好地调动起来了。无论是领导和群众都非常关心企业的兴衰、得失，真正出现了爱厂如家的局面。与此相伴，这些企业的自主权也比内地企业更大，主要是给以人事调配录用权，财务管理使用权，生产计划调节权，商品销售与物质供应选购权，对外引进洽谈权以及工资制度改革权等等。

第四项，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进行体制改革。经过改革，市一级领导干部由原来18人减为8人，市属局级机构，由65个精简为33个。全市党政机关原有2237人，精简后仅有867人。我们到市政府了解情况，深感经过精简后的市政府工作人员确实比较精干。所接触的同志绝大多数对本部门经管的工作和下面的情况了如指掌，讲出来的东西大都是你正需要的东西，而且前面不带很长的“开幕词”，后面没有很多的“结束语”，十分干脆利落。企业领导机构的精干则更为突出。在深圳，不管你走到那个工厂，都找不到它的办公大楼，也没有科室机构，办公室一般设在某车间的一角，脱产人员都只有一长（或二长：即正副厂长）几大员。服装厂

是一个拥有415名职工，350台衣车，经常同七八户客商打交道，产品远销中东、欧美的大厂，全部脱产人员也只有一长十大员，加一个支部书记。十大员是：生产计划调配员、业务员、包烫管理员、治安员、政工员、保管员、行政管理员、会计员、出纳员、生产技术管理员。要是在内地，这样的工厂没有四五十名脱产人员是下不来的。为了减少非生产人员，很多厂长都学会了开汽车，既当厂长又当司机，外兼采购、推销。当司机的也不是“专职司机”，一般都是兼管采购、推销、装卸的“三合一”、“四合一”的司机。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视野里真是唯特区所仅见。

第五项，在干部的吸收和任用上，在一些单位开始打破委任制，试行招聘制和选举制。比如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的领导成员，就是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用民主的方法，在没有候选人的情况下，无记名公开投票选举出来的。党委书记袁庚说：“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至关重要。我们想搞个改革试点，今后每半年群众投一次信任票，全体职工对管委会有半数不信任者，管委会就得改选；个人有过半数不信任者，他就得下台，重新改选。”83年年初，市委给嘉年印刷厂派去两名可以担任副经理的干部，该厂经过近半年的试用、考察，才正式任命他们为副经理。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出效率，出速度，出智慧，出人才”这就是深圳人民的深切体会。

五、特区人民的生活怎么样？

随着特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速度之快，凡是到深圳调查考察的同志无不为之惊讶和振奋。

先看城乡人民的收入。办特区前的1978年，深圳市（原宝安县）农村人平纯收入134元，1983年增长到469元，五年增长2.5倍；万元户从无到有，83年全市（包括非特区）涌现了2400多户；其中特区内有近2000户，占特区农户总数的20%左右；特区内还出现了三个万元村，即罗湖区的渔民村、渔农村，罗芳大队共102户，家家收入过万元。特区国营企业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从办特区前的47元增加到83年的110多元，一些办得好的企业，工人每月工资达二、三百元以上。

再请看人民的实际生活。1979年到1983年深圳市建成的住宅面积达137万平方米，城镇人均住宅面积由1978年的2.74平方米增加到1983年的7.5平方米。在农村，则建起了许多别墅式的小洋楼，有的比省、军级干部的住宅还宽敞、高级。今日的深圳，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音响组合、沙发不再是什么高级消费品了，已基本上成为人们的必备生活资料，为大多数干部、职工家庭和相当大一部分农户所拥有。至于人们的衣食、娱乐也处处显示着特区的富裕和繁荣。

下面是我们在万元村之一的罗湖区附城渔民村大队的点滴见闻。这个村共35户，144人，住的是同一规格、同一形状的别墅式的小洋楼，每幢占地200平方米，造价三万多元，由集体出资统一兴建。小洋楼分两层，每层都是两个主室、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一个储藏室，大小共十二个房间。楼上前有阳台，后有凉台，楼宇四周，外有围墙，内有庭院。庭院里种着花卉，阳台上摆着盆景。我们参观了一家农户的室内，上下客厅铺的都是铮光发亮并带有彩色图案的瓷砖，吊着通常宾馆才有的五彩缤纷连环灯；每个客厅都摆有两张长沙发，两个茶几，一个组合柜；每个组合柜上各有一部20寸的彩电，一部音响组合，上客厅的组合柜

上还陈列着“寿星、罗汉、观音”等十多个古玩。家里还有八张单人沙发，一个双门电冰箱，一个双缸洗衣机。其他如：床铺、衣物、桌椅等也都相当高级、雅致。走进厨房，煮饭用电饭煲，烹调烧煤气，干净得同客厅、卧室一样，一尘不染。末了我们又留心了一下庭院，见有各种花卉盆景40多种，院墙内侧一角围有一个小鱼池，鱼池中央垒着一个假山，池子里流水不断，养着金鱼和斤把两斤重的随时食用鱼。

该大队还规定男社员60岁，女社员55岁可以退休，每人每月退休金40元，年终另发120元。社员治病，小孩上学，费用全部由大队支付。去年九月，几位墨西哥朋友听了渔民村的介绍，从北京专程来到渔民村，亲自查对大队的收支账，挨家挨户参观核对，最后信服地竖起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这里称得上最富裕的农村，中国的开放政策是成功的”。

当然，渔民村是富裕中的典型，在特区能够过得上这种生活的目前还不到十分之一。但市委的同志告诉我们，差距正在缩小，只要特区的工作不发生大的失误，在整个特区实现生活现代化也不需要很长的日子了。

六、有人说，深圳的冒尖户、冒尖村主要是靠走私富起来的，对不对？

勿庸讳言，试办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确实给走私贩私提供了一些方便条件。比如很多边境居民持有过境耕作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有部分耕地在香港新界那边，名之为“插花地”。）、下海作业证，可以经常进出香港新界，政策又允许他们将自己生产的农、渔、副产品直接拿到香港市场出售，并适当购回部分生活用品供自己使用（“自己生

产”、“自己使用”的界限执行起来，很难掌握）；放宽了港澳同胞和客商的进出规定；特区在试办阶段制度和边防管理不很完善等等，这都在一定程度上给那些不法之徒和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带来了一些可乘之机，也确有一些人是通过走私贩私而发了横财的。但是随着特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深入开展，加上特区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劳动光荣、劳动致富的教育，特区居民走私贩私的现象越来越少了。他们说：“党中央给我们提供了劳动致富的条件，我们是劳动人民为什么要去搞歪门邪道呢？”“靠歪门邪道捞钱，得了不光荣，富了不舒服”。

下面是附城渔民村大队1982年的收入账，也可以说是他们的“致富账”。

第一笔收入：养鱼（名为渔民村，实际上多年不捕鱼了，改为养鱼。大队有鱼塘150亩，与友邻大队合养170亩，收入17.3万元。

第二笔收入：搞运输和挖河沙出卖。大队有两条100吨位的运输船，四台载重8—10吨的汽车，一台铲沙机，二台推土机，收入50万元。

第三笔收入：引进外资，来料加工；同港商合作种花、养金鱼。收入6.75万元。

第四笔收入：同东莞县内联合办饮食店两家。收入3.3万元。

第五笔收入：养猪。1.4万元。

共计收入78.75万元。其中分配给社员38.5万元，人平收入2750元，户平收入11,000。

另外，家庭副业收入（主要是养鸡）平均每户收入2500元左右。

这就是他们大队的致富之道。

渔民村大队有没有走私的呢？个别情况还是有的。83年10月2日，有一个党员捎带了25块手表，被海关发现，经教育罚款后放了。但海关放了，支部不放，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已报上级待批），说这种人给共产党丢脸，不配当党员。

为了防止走私现象发生，渔民村大队在搞好教育的同时，考虑到下海作业的部分社员进出不走海关，还通过公安局请了两个检查人员专门检查他们，工资由大队支付。

除了重点解剖以外，我们还带着这个问题，请教了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同志，他们的结论是：深圳的冒尖户、冒尖村并不是主要靠走私富起来的，而是一靠政策，二靠劳动。

七、有人说，深圳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它得天独厚的条件，对不对？

不错，深圳这几年发展如此之快，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它紧靠香港，更便于利用客资和港澳市场，引进先进技术，并发挥自己的优势等等，这是内地所不及的。但把得天独厚提到“主要”的位置就经不起推敲了。人所共知，深圳那些“独厚”的条件，并不是今天才“独厚”的，为什么只有近几年才有如此快的发展变化呢？应该说，主要还在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政策正确。三中全会后，天还是那块天，地还是那块地，深圳的经、纬度一点也没有变化，可在这片地上，修起了上千幢高楼，几十条大道，公路上有了那么多大车、小车，群众家里有了那么多冰箱、彩电，农民新建了那么多别墅式的小洋楼，所有这一切主要靠的是政策的力量，政策的威力是多么巨大啊。

当然，内地是不可能象深圳特区那样，变得那么快，富得那么快的。但深圳人说得好：祖国是母亲，一个母亲有十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先富起来，也总比十个儿子都穷要好一些，更何况三中全会后，其他九个儿子也在迅速地富起来呢？党中央在共同富裕的总目标下，敢于让一些条件好的地区先走一步，这也正是她英明所在。

这次到深圳，工人、农民、基层干部对党中央，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那种拥护感激之情，对我们教育太深刻了。许多农民、工人在谈到近几年家乡、家庭的变化时，真是激动得热泪盈眶。附城渔民村大队支书吴柏森对我们说，他在参加六届人大时，中央首长找他座谈，问农民有什么要求，他说，国家目前还有困难，其他要求我们农民都不提，只要求党的政策不要变。告别时我们向他表示感谢，他紧紧握着我们一个同志的手连声说：“不，不，要感谢党中央，感谢党的政策。”多么真挚的感情啊。

八、特区的精神文明怎样？

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个问题是，有些同志往往只注意到试办特区对精神文明的消极影响，其实，特区建设的大量事实证明，积极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一）特区经济建设的飞跃发展，极大地鼓舞了特区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四化的热忱，振奋了民族精神。（二）人民生活随着特区的发展日益提高，更加感到党的政策英明，更加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特区企业现代化的生产和科学管理方法，对洗刷“大锅饭”、“铁饭碗”下养成的懒散习气，冲击管理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四）特区经济的发展，